

皮路燈  
論  
叢  
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弦生

346  
《歧路灯》论丛

第二集

本社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许昌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52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40册

统一书号10219·57 定价 1.40元

## 出版说明

本书选收了范宁、王昌定、陈美林等三十五位古典文学研究者的三十余篇论文。文章大部分写于1982年洛阳《歧路灯》学术讨论会前后，为首次发表。从中可以看出，近来对《歧路灯》的研究又有了许多新开掘，取得不少新成果。

在编排上，这一集和第一集相同，仍以文章内容分类，按写作先后为次。书末附有1928年以来的《歧路灯》评介文章目录，以便于研究者查找参考。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3年12月

## 目 录

- 《歧路灯》读后感 ..... 范 宁 ( 1 )  
满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学”  
——略谈《歧路灯》的教育思想 ..... 曾广文 ( 7 )  
略论《歧路灯》第五回及李绿园的  
创作思想 ..... 曾秀苍 王昌定 ( 16 )  
《歧路灯》与《儒林外史》 ..... 陈美林 ( 35 )  
《歧路灯》再探 ..... 田 璞 ( 51 )  
略谈《歧路灯》 ..... 邢治平 ( 63 )  
论《歧路灯》创作中的矛盾性 ..... 袁 健 ( 70 )  
批判中的维护与维护中的批判  
——《歧路灯》作者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初探 ..... 舒安娜 吴剑锋 ( 84 )  
《歧路灯》何以遭受冷遇和流传不辍 ..... 胡世厚 ( 93 )  
《歧路灯》简论 ..... 杜贵晨 ( 108 )  
关于《歧路灯》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 吴志达 陈文新 ( 127 )  
略论李绿园世界观中的积极因素 ..... 张亚新 ( 143 )  
《歧路灯》向我们提供了什么 ..... 李文焕 ( 156 )  
关于《歧路灯》的“主线” ..... 廖高群 ( 167 )

- 《歧路灯》的主题、结构和人物 ..... 杨海中 (177)
- 《歧路灯》纵横谈 ..... 孟繁仁 (192)
- 《歧路灯》断想 ..... 王 基 (202)

## 败家子的典型

- 试论《歧路灯》主人公谭绍闻 ..... 杨芷华 (211)
- 论王氏 ..... 张清华 (222)
- 又一个封建末世“傻公子”的典型形象

——试评盛希侨 ..... 欧阳健 (229)

## 一个维妙维肖的市井无赖形象

——略谈夏逢若 ..... 马晓玲 (241)

浅谈韩氏和孔慧娘之死 ..... 弦 声 (249)

## 在长满荆棘的路上迈进

——李绿园的保守思想对

《歧路灯》语言的消极影响 ..... 张鸿魁 (256)

评《歧路灯》 ..... 佚 名 (263)

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 ..... 徐玉诺 (271)

墙角消夏琐记(其一) ..... 徐玉诺 (276)

墙角消夏琐记(其二) ..... 徐玉诺 (280)

徐玉诺与《歧路灯》 ..... 刘济献 (282)

《歧路灯》札记 ..... 关贤柱 (287)

李绿园家世订补 ..... 栾 星 (297)

《歧路灯》创作的时代背景 ..... 尚达翔 (304)

《歧路灯》所反映的经济生活 ..... 高明阁 (314)

《歧路灯》所写清乾隆前期戏剧团体的经营 ……张发颖 (327)  
读《歧路灯》散札 ……………孔宪易 (335)

《歧路灯》评介文章目录 (1928年4月—1983年5月) …… (343)

## 《歧路灯》读后感

范 宁

《歧路灯》一百〇八回，清乾隆时人李海观著。海观(1707—1790)字孔堂，号绿园，祖籍河南新安。康熙三十年(1691)豫西新安等地大饥荒，海观祖父携家逃难到汝州宝丰县住了下来，遂为宝丰人。他一生只做过一任知县，是一个失意的文人。《歧路灯》有人说原本百二十回，今存百〇八回，不是足本。但从小说故事说，百〇五回已经结束，最后三回已是蛇足了，百二十回的说法，恐不可靠。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一个青年，由于家庭母亲溺爱，管教不良，以致被一批诈骗者勾引，聚赌宿娼，走上堕落的歧路。后来靠亲戚朋友的挽救，加上自身遭受到一些折磨，翻然悔悟，回到读书做官，所谓封建地主阶级的子弟的正途。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主题的选择不高明，主要人物形象塑造也不很成功。但作品中记录了历史上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面貌，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形形色色的怪现象，尼姑成了公开的妓女，老婆也可以作为骗钱的工具。官吏豪绅串连一气，贪污贿赂，枉法徇情，无恶不作。其中有些场面展示出一幅一幅的百丑图，给人们提供了认识和了解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生活黑暗的罪证。就这方面说，这本小

说还是有意义的。认识到旧中国地主阶级生活堕落腐朽，假仁假义，才能够真正懂得新中国社会主义好。此外小说中的语言也是很成功的，有些对话，逼真生动。个别人物如孔慧娘，比起《儒林外史》里那位鲁小姐来，性格刻画含蓄而不外露，心理克制得象一潭死水，这里面有些值得人们深思的东西。

五十多年前，朱自清先生有一篇评论《歧路灯》的文章，从题材、结构、描写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肯定了这个作品。由于朱先生撇开作品的主题思想，而且所见到只是前面二十六回，未窥全豹，评价上今天看来，有些不完全切合实情。我现在也从这三方面补充朱先生意见，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先谈题材。《歧路灯》主要写的是一个败子回头的故事。败家子谭绍闻不仅败掉了谭家的产业，而且败坏了谭家的声誉，同时也败坏了封建国家的纲常名教礼义廉耻。在做坏事时，开头他思想上有点矛盾，情欲和理智在内心中交战，结果总是做了情欲的俘虏。家有妻妾，还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受人愚弄，可笑又复可怜。后来在亲戚、父执、义仆的帮助下回头了，回到哪里去？回到封建地主的老窝，做一个精干的封建阶级的孝子贤臣。这时情欲和理智都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有名教道学，而谭绍闻成了程朱理学卫道士。这部长篇小说八十回以前，作者恨铁不成钢，在叙述谭绍闻所作所为，主要是嫖赌的过程中无意泄漏了地主阶级生活的荒淫无耻和贪残诈骗。八十回以后的谭绍闻就只是“家为顺子，国为良臣”。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而转；妻贤子贵，诸事满足。至于义仆帮助主子重整家园，这在《醒世恒言》中就有《徐老仆义愤成家》，封建地主阶级是经常表扬这种事迹的。谭绍闻虽然讨厌老仆王忠，但王忠恋主情深，时时刻刻都关心谭绍闻。王忠替主子筹画还清了积年的嫖赌



欠债，就开始替主子出谋划策，买田置产，认为“万物皆从土里生，用的银钱也是庄稼来的”。只要有颗“勤俭的心”，恢复旧业，重做财主是不难的。王忠就这样从义仆变成了谭家的功臣。不过谭绍闻并不只想做个财主，他改志读书，中了副榜，报国立功，回到家中，“开门一看，较之父亲在日，更为佳胜”，“到堂楼，一家围坐”，一切都称心如意。这时谭绍闻已经不是败子，而是一个“清官”。

的确，通过谭绍闻前后生活的变化，《歧路灯》不仅写家庭生活，而且写了社会生活。除正人君子，富商大吏出现作者笔下以外，还有赌徒光棍，妓女媒婆，衙役乡绅，塾师幕僚，江湖术士，牙行经纪；所描写的生活场面，就题材说，它比《红楼梦》局限于家族盛衰，爱情得失，是要广阔一些。但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于题材的广窄，而在于主题思想的深刻或肤浅，以及写作技能的高下。生活面广只能给人多了解一些世事人情的知识，不能使人认识社会和人生的本领，更不能增加艺术的感染力。《红楼梦》揭露了衰败中的社会里两代人的矛盾，新生的婴儿被腐朽的霉味窒塞得透不过气来，令人产生沉痛感。而《歧路灯》呢，只是对社会上一些浮浮泛泛的现象触动了一下，缺乏更深刻的揭露。

当然，《歧路灯》中所写的事实，在封建社会中，甚至资本主义社会中，也都可能发生。历史上财权和政权的再分配是多种多样的。不义之财的攫取是多渠道的，不择手段的。谭绍闻所走的正路就是贾宝玉所唾弃的仕途经济。

至于《歧路灯》的结构，不蔓不枝，首尾照应，情节变化紧紧扣住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变化，没有头绪纷繁、组织松懈的毛病。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通过家族的纽带把同一族姓人的命运拴在

一起，显示封建宗法的力量，体现作者用心和作品主题思想是一致的。促使谭绍闻生活发生变化的真正力量不是老仆王忠的忠告，而是族人谭绍衣的援助。没有谭绍衣，谭绍闻是挤不进官场的。进不了官场，回归“正路”是不可能的。

《歧路灯》通过谭绍闻“今是昨非”的生活变化，把封建地主阶级官场的丑恶一面和地主阶级要求清廉正直的官吏的另一面对照起来描写，使人感觉到谭绍闻的确走上了正路。大有太阳出来，烟消云散，好人露面，妖怪俱藏之势。作者让情节自然流动，达到故事前后一致的有机结合。这就使得小说作者在情节安排上，前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匠心独运，正表现《歧路灯》在结构上的一个优点。

也正因为如此，作品显得叙事多于描写。三个重要人物，谭绍闻、王氏、王忠刻画性格的地方都不细致，人物也不生动。作者重事理而不重情趣，劝诫意识浓，抒情味道淡。我们把《歧路灯》和《红楼梦》一对比就清楚了。《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一个个都感情饱满，贾宝玉被人称为情种。他们生活中充满了情趣，作者曹雪芹抒写这种情趣也十分细腻。至于《歧路灯》就不同了。写人与人之间往来和纠纷的事很多，而且充满说教传道。陈腐的理学三纲五常的摆弄，夫妇朋友之间冷冰冰的。没有乐趣，没有真正的爱情和友谊。人生只是履行孝子忠臣的职责，结婚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如此而已。这也就是说，《红楼梦》以写人为主，《歧路灯》以写事为主。由于以事为主，所以不十分重视人物性格塑造。贯串全书的是事与事的联系，人是因事而存在。作者要写一个败子回头的故事，用以警世，这样就出现了谭绍闻，让谭绍闻充当这个角色，故事变化和发展一点也不受到谭绍闻个人性格的制约。从败坏三纲五常到维护三纲五常看不出

谭绍闻个人性格起到决定作用，这个人实在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个性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歧路灯》中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都不鲜明突出。

下面我们就接着谈谈《歧路灯》中的描写。上面我讲《歧路灯》是以叙事为主，并不是说《歧路灯》中完全没有人物描写。朱自清先生说：“谭绍闻、王隆吉、盛希侨都是好人家子弟，质地都是好的，都是浮荡少年；这样地相同，而度量、脾气又是怎样差异！”这就是说这三个人物是各具特点的。的确，这三个人给人的印象不一样。盛希侨有点豪侠气，王隆吉颇规矩，谭绍闻四不象，形象并不那么明晰。这样所以朱先生又说：“作者阅世甚深，极有描写的才力，可惜并没有尽其所长。”对于书中人物性格，作者“不要也不肯淋漓尽致或委曲详尽地写出来。”在《歧路灯》中主要人物谭绍闻做的事情很多，但性格刻画并不鲜明，没有做到“淋漓尽致”。倒是那个孔慧娘的性格，虽然着墨不多，给人印象还是深刻的。《歧路灯》中的妇女形象写得更多的是谭绍闻的母亲王氏。王氏是一个没有头脑，没有远大眼光，也没有见识的世俗妇人。这个相当糊涂的女人和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比较起来，更为庸俗，不象王夫人那样矜持。她对待子女也不象王夫人那样严。有一次，她让谭绍闻去赶会，向丈夫谭孝移说：“这吹台三月三大会，叫孩子跑跑去。读了两个月书了，走散走散，再去读书何如？”谭孝移回答说：“小孩子赶会，有什么好处？不去罢。”她大不以为然，说：“这个说不好，那个说不好，如何会上有恁些人？我当初在家做闺女时，我爹爹性儿甚是严谨，到这三月三，也还叫我娘引我，坐车到会边走走。”谭孝移不觉笑了，说：“妇女上会，也不算他外公什么好家法，你不说也罢。”她很不服气说：“偏你家是有家法人家！我见那抚院、布、按大

老爷们，这一日也去赶会哩。”这一段对话，活龙活现地表明了两个人物不同的性格，语言十分生动。《歧路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虽不很成功，但运用塑造人物的描写手段的语言却相当熟练精巧，特别是对话中的语言。作者使用了河南地方语言，然而不显出十分土气，如第七回长班说：“硬过船，软过关。”又如八十五回王象荇（即王忠）和谭绍闻讲，“俗话说：‘千行万行，庄稼是头一行。’”“一家做官，等着吃穿”等等。

总之，《歧路灯》整个思想主题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但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思想状况和生活状况，涉及社会面相当广阔，宦门子弟的堕落放荡，书办、皂役的为非作歹，士人学究的空虚迂腐，星卜相士的迷信活动，绅士豪门和官府的勾结，尼姑、妓女和光棍的胡缠，光怪陆离，应有尽有，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到封建社会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人间地狱。作者以酣畅的笔墨，沉痛的心情，向人们讲述出来一个败子的故事，耗费了大半生的精力，还是有所收获的。《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也是一个败子故事，但杜少卿这个败子没有回头。《歧路灯》中谭绍闻却从恶劣而腐臭的环境染缸里爬了出来，改邪归正，回头了。同样写败家子，写法不同。讲说败子回头，在民间故事中很多，而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写出来，《歧路灯》是有特色的，这也就使得《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在封建后期的社会中，百病丛生。谭孝移临终嘱咐儿子说：“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希望他的儿子能在滚滚浊流中站住脚跟，只是一个希望。远不如王氏说：“世上只要钱，不要书，我是个女人，也晓得这个道理。”讲得十分透辟。这个女人，糊涂一世，这倒是一句聪明话。

# 满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学”

## ——略谈《歧路灯》的教育思想

---

曾广文

---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歧路灯》，是清人李绿园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栾星同志为整理、校注这部小说曾花了十年功夫，认为它“是清人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之外，又一巨著”。（《歧路灯·校本序》——以下简称《校本序》）姚雪垠同志为《歧路灯》作序，指出《歧路灯》的产生，“标志着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第三阶段已经成熟”，“必须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中给予应有的地位。”《歧路灯》的出版，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姚雪垠同志除高度评价《歧路灯》在艺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外，还根据它的思想内容，联系今天“做父母的如何教育子女，青年人如何不受流氓阿飞的引诱”，提出了“思想上的借鉴作用”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就此略加分析，作为对姚序登高一呼的响应。

## (一)

《歧路灯》成书至今已二百年。在长期流传中，人们“多以教子弟书看待”。（《校本序》）群众对《歧路灯》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同作者著书的目的相吻合的。作者曾开宗明义在第一回的开场白中指出：“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接着，就概括地指出了青少年走上成败道路的各种因由。既指出了内因——青少年本身所具备的“姿禀”、“气质”；也讲到了外因——对青少年所施行的教育、青少年往来结伴的人的相互影响。作者把这些内因和外因看成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认为：什么样的内因和外因，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虽然如此，作者在小说的用笔上，却有所侧重，正如第三回娄潜斋所说：“这兴败之故，上关祖宗之培植，下关子孙之福泽，实有非人力所能为，不过只尽当下所当为者而已。”什么是当下所当作为者？这就是：抓好家庭管教和慎择师友。作者把家教、师教、朋辈结交看作是影响青少年成长变化的三个重要因素。作者把《歧路灯》的主人公青年学生谭绍闻（小名端福儿）塑造成意志薄弱，有待施加影响的典型。通过这一典型形象的发展变化说明：在家庭、老师的良好教育培养下，青少年可以成为“神童”，前途远大；而失去家庭管教、择师不慎，就会为社会上浮浪子弟和“匪人”所引诱，而陷于下流，步入危险的歧途。

围绕主人公谭绍闻一生的兴衰成败，作者还塑造了另外一些青少年形象：有的或者因为缺乏家教、师教，或者因为和酒徒赌棍等匪人结交往来，而陷入下流，自食恶果，如柴守箴、阎慎的

戴枷（第五二回），小豆腐的受杖（第六五回），窦又桂的悬梁（第五一回），管贻安的服绞刑（第六四回）等；有的则因为家教严、师教好，结交正人，而获得较好的前途。

在家教、师教和结交三因素中，作者特别强调的是结交。除了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上突出这一重点外，还反复引申“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第十七回、二一回）这样的警句。

总之，全书一百〇八回六十余万字都是围绕着论证作者关于家教、师教、朋辈交往的观点展开的。作者目的在于运用文学艺术魅力阐述宣传传统的教育思想，影响社会，引起做父母、师长的重视青少年教育，引导青少年走正路，以维护封建社会的道统和秩序。

## （二）

作者从自己教过书、任过知县的一生阅历中，总结了人生成败在于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家教、师教和社交环境影响的规律。作者不仅在《歧路灯》中再现了这一规律，而且据此提出了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培养的八字方针：“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围绕这一方针的提出，作者用十一个回目写谭孝移对自己的儿子如何严加管教，如何慎重地为儿子延师、择媳，并不惜让其为儿子的未来而苦思焦虑，忧愤成疾，过早地离开人世以作为这一教育方针出现前的铺垫。

在花费大量笔墨之后，作者才在“谭孝移病榻嘱儿，孔耘轩正论匡婿”的第十二回里运用典型、夸张的手法，让谭孝移在临终的遗嘱中，向儿子反复叮嘱“要记着：用心读书，亲近正人。”

病人在大烧大泻之后，在临终衰竭的痛苦之中，当面令听者复述遗嘱不算，还要叫复写；写了不放心，还要对儿子讲述遗嘱的好处；生前叫儿子记住不够，还要求死后埋前如何，埋后如何。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很难出现，但在典型环境中生离死别的细节描写却尽在情理之中，不能不给读者留下深刻而强烈的印象，由此可见作者对其八字方针之重视。

八字方针出现以后，作者就以此为核**心**，结构故事情节，刻划人物，让这八个字在重大情节转换以及主人公谭绍闻的兴衰成败的关键时刻反复出现。如：第五二回谭绍闻因赌债涉讼，面临出乖露丑的窘迫时刻，梦见其父“双目圆睁，怒须如戟，开口便道：‘好畜牲！我当初怎么嘱咐你，叫你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第五四回谭绍闻逐走忠仆王中时，王中哭说道：“只是大爷归天时，说了八个字，‘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是大爷心坎中的话，大相公行事，只要常常不忘遗命，王中死也甘心。”第五九回谭绍闻“忽的又想道：‘父亲临终时节，千万嘱咐，教我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我……这样的人死了何足惜！’”于是引颈投环自缢。类似的思想、谈论，全书俯拾皆是。

此外，作者还通过小说中的各色人物，从不同角度议论肯定这八字方针的重要意义。最后，作者让书中青少年的楷模、正派读书人的典型代表、河南巡抚谭绍衣画龙点睛，对八字方针进行了大声疾呼的神圣总结：“这是满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学’，是咱家子弟的‘八字孝经’。”要“镂之以肝，印之以心。”“用以为子孙命名世系。”（第九五回）至此，作者语重心长，呕尽心血倡导八字方针的思想感情才算倾泻无遗。

因此，作者是把八字方针看作青少年步入正途的门径，必由之途。



### (三)

“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既是《歧路灯》培养教育青少年的指导方针，也是手段。按照这一方针，运用这种手段，应该向青少年进行哪些教育，达到什么目的呢？

“穷经致用”同“专弄八股”、“急于功名”，是《歧路灯》为了指明教学内容和目的而提出的一对矛盾。第十一回谭孝移指斥先生侯冠玉丢弃“经书”不学，弄八股时文，教学生学《西厢》、《金瓶梅》一类书的“文章法子”是“杀吾子矣！”为此，作者对侯冠玉大张挞伐，揭先生的老底：“在家下弄出什么丑事，落了没趣，又兼赌债催逼难支，不得已，引起董氏，逃去省城，投奔他亲戚、开面房的刘旺家。”嘲讽侯先生“论起八股，甚熟于‘起、承、转、合’之律，说起《五经》，极能举《诗》《书》《易》《礼》《春秋》之名”；奚落他醉酒烂赌、算命说媒、看阴阳、写呈状、科场当枪架子、枪手……无所不为。相反，讲“穷经致用”的，则被作者描绘成“正经读书人”，“上焉为德”“下焉为民”，端方博雅，见事精明，任事干练，正直清廉。显然，作者主张“穷经致用”而反对弄八股，急于功名。

《歧路灯》所谓“穷经致用”是通过“穷经”，向青少年进行两方面的教育：其一是传授“有经济的学问”（第四回），即维护、巩固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安邦定国”的管理知识；其二是灌输“圣学命脉”——“诚意正心”一套理学的思想体系。《歧路灯》教育培养后代的目标，主要还是“学而优则仕”。按照做官，维护封建传统的需要出发，作者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直接把这些经世致用的知识介绍、传授给读者。《歧